

西藏乡村振兴走内生式发展路径研究

——以拉萨市为例

田笑

(西藏民族大学 民族研究院, 陕西 咸阳 712000)

【摘要】内生式发展是实现乡村振兴的有效途径之一,大力激励西藏运用内生式发展动力对西藏开展巩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工作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如何充分激发出西藏发展的内生动力,靠自己的双手创造财富是西藏乡村振兴衔接和后续工作的一个非常值得思考的议题。多年来,西藏产业发展滞后、各界人才匮乏、本土文化得不到有效开发、生态红线制约等问题一直制约着西藏的发展,怎样走一条内生式的发展道路是本文探讨的焦点,结合笔者对拉萨各县区的深入调研,本文首先从“外源性”角度指出拉萨目前乡村振兴工作中面临的问题与困境,其次从“内生式发展”理论角度探讨一条适应拉萨乡村振兴工作的内生式发展路径。

【关键词】内生式发展;乡村振兴;人才

一、理论基础

“直接帮扶”是快速缩小城乡差距的方法之一,即依靠乡村以外的力量推动乡村快速发展以跟上城市发展步伐。20世纪40年代,西方国家急于解决城乡问题,出现了“外源性”发展模式,这“是一种由外来企业依托政府开发援助来进行地区开发的方法。”^①外源性发展的特点有:一是工厂进村,在农村开设大型加工厂,将农民招为工厂工人,快速解决农村人民收入少的问题;二是企业承包农村产业,由企业承包农村产业,将农村产品以低廉的价格集中化、品牌化,由此提高农民收入;三是推广现代农业技术,通过现代化种植手段以提高农产品产量;四是农村人口转移进城务工,直接减少农村贫困人口;五是政策补贴,由相关部门以贫困补贴的形式直接帮扶。外源性发展模式能快速缩小城乡差距,但也对环境保护、文化遗产、资源可持续性带来了伤害。

20世纪70年代,众多研究发现了外源性模式对乡村长远发展的众多缺点,“内生式”发展模式应运而生。最早提出的是1997年瑞典Dag Hammarskjöld Foundation在联合国作“未来发展”报告,指出“从个人自由和人类全面发展的角度来理解发展,那么发展就要从社会的内部来推动”^②。20世纪80年代,内生式发展在南欧乡村得以实践,但当时忽略了与外部资源相结合,认为内生式发展是脱离现实的“理想化”模式^③。20世纪90年代,日本学者鹤见和子等人提出内生式发展理论,认为该理论应该要将

“内源性”与“外源性”相结合,而不是绝对对立^④。21世纪初,英国学者Christopher Ray提出“新内生式发展”,主张“新内生发展理论强调乡村发展基于本地资源和本地参与,并以本地与周边环境的动态互动为主要特征”^⑤。内生性发展也有其独特优势:一是推动发展的主体是乡村本地人,可以是农民、基层干部、返乡农民工,总之是本土人;二是当地人所熟知的产业,可能是世代传承下来的手工艺品,也可能是对当地传统产业的延伸且被当地人普遍认同的产业;三是组织结构是在政府与外来企业的辅助下形成乡村集体经济、乡村合作社等。

二、拉萨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发展现状与困境

拉萨地处西藏腹心地带,与多个市区接壤,下辖8个县区。通过笔者在西藏参与开展的乡村振兴大调研活动,对其8个县区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实地调研。此次调研旨在探究拉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过程中出现的困境,为拉萨各县区的有效衔接工作出谋划策。

(一)“土地流转”下农牧民“等靠要”思想严重

2002年,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中明确指出“农民承包的土地在不改变用途的情况下可以流转”。鼓励农民进行土地流转的趋势不变。调研发现,拉萨各县区在土地流转给村民带来较高的经济收入的同时,农牧民“等靠要”思想不断加重,农牧民尝

到土地流转的红利后不愿自己种地。而地处青藏高原的拉萨，因环境气候原因，并不是所有土地都能如愿一直能够租赁，这时退还给农牧民的土地需他们自己种植，但他们大部分又不愿意种植，于是土地开始荒废。因为耕地红线的制约，耕地只能用作种植庄稼，不能用作商业用地和建设用地，于是相关部门对于荒废的土地想了很多办法也没能“盘活”。

（二）产业发展脱离乡村传统产业

产业助推西藏乡村振兴是学界研究的重要视角，发展产业可提高村民收入，产业发展起来了村民的收入自然就高了，这是一个相对固化的思路。拉萨各县区投入大量资金广泛开展产业项目，但结果却不尽如人意。以Q县为例，2016年至2020年，该县共实施73个产业项目，共融资5.8亿，一定程度上为Q县奠定了良好的产业基础。但算得上成功的产业仅3个，即藏鸡蛋养殖、藏中药材种植、蔬菜种植，其中藏鸡蛋养殖产业全由相关部门带头养殖，没法普及家养，主要原因是藏鸡蛋养殖要求安静的环境，加之藏鸡蛋成长期对于鸡的淘汰率较高，而藏族传统不杀生的观念让老百姓没法接受这一点，于是导致该项目不能作为一个普及性的养殖技术教授给当地群众，某种程度上阻碍了村民的参与度。

（三）“自下而上”的组织运作模式不成熟

我国古代习惯运用“自上而下”的管理模式，即君主专制下皇权的权威性难以撼动。^⑥“自上而下”的政治管理模式是费孝通教授提出的“双轨政治”中的一轨，运用到现如今拉萨乡村振兴衔接工作中的组织运作方面，可以理解为：主要由政府和企业牵头和负责，而非村民自发组织起来的运作方式，它涉及人才、文化、产业、生态方面的组织管理形式，前文案例中Q县的藏鸡蛋养殖产业就是由政府主导，当地村民很少参与其中。以农民增收机制之一的合作社为例，“自下而上”的运作模式则是指在政府和企业帮扶下，村民自发组织起来的农业合作社或集体经济。根据调研发现，拉萨各县区目前正在逐步发展合作社经济，但实质上拉萨所推广的合作社大部分对政府的依赖性比较高，因而合作社发展速度较慢、同质化严重、运作模式不成熟问题突出。

三、拉萨乡村振兴走内生式发展的路径探析

内生式发展与拉萨乡村振兴工作具有较高的适配度。拉萨乡村振兴衔接阶段还处于受“外源性”发展影响较深的阶段，虽有向“内生式”发展迈进的迹象，但其本质对“外源性”力量的依赖较重，

在衔接阶段及时引导拉萨从“外源性”与“内生式”相结合，在依靠“外援性”的同时慢慢向“内生性”过渡，有助于推动拉萨迈过过渡期后乡村振兴工作全面展开的健康、平稳、持久的发展。

（一）主体：激发乡村主体动力

乡村振兴工作最关键的是培育一批懂农牧的工作队伍。“乡村振兴，关键在人”，拉萨相关部门、行业干部真正懂农牧业、爱农牧业的人才很少，除当雄市为纯畜牧业外，其他县区均是农牧结合区。农牧民长期依靠“外源”力量的帮助，对外在依赖性越来越强，“等靠要”思想严重，这种思想观念阻碍了拉萨乡村的发展，因而激发当地群众的主体能动性应是首要任务之一，“无论是什么样的开发政策，没有当地居民的积极参与，都是不可能保证其持续性的。这个道理已在世界各地得到证明。”^⑦拉萨各县区应结合本地情况。一是挖掘乡村“能人”“致富带头人”或是村里有威望的人，这些本地人不仅在当地村民中具有较高的威望还有一定的能力，这些人在村里宣传“劳动致富”具有较高的可信度和认同度。二是重视妇女的作用，妇女“半边天”的作用在拉萨藏族群众家中，传统上藏族男性外出放牧或工作，妻子做家务、照顾老人小孩，现如今拉萨各县区近一半的女性也开始工作。除此之外，拉萨各大旅游景点卖的手工艺品大部分都是从尼泊尔或浙江运到拉萨，可以从这个方面入手激发妇女们的内生动力。三是学生群体，拉萨各县区中小学使用的教材、教学方案、教学课程均为全国统一形式。农牧人才是拉萨目前最缺的人才，生活在农牧区的学生对农牧知识有一定的基础，学校教学可以结合地方性知识授课，一方面增加教学趣味性，有利于教学课程的教授，另一方面也能激发学生对农牧行业的兴趣，为农牧业培训更多的本地人才。

（二）产业：以乡村传统产业为主的产业发展模式

产业发展一直是拉萨各县区发展短板，实质上各县区每年开展的产业项目并不少，投入的资金也不低，投入与产成反比是拉萨乃至西藏大部分产业的通病。拉萨各县区因地理位置、环境气候等的不同，各有特色。产业发展不能离开传统，在保住传统产业的基础上再慢慢试行其他产业可能会比较适合拉萨各县区的产业发展。第一，产业以农牧业为主。拉萨各县区主要是农牧业主导型的地区。当雄县之所以能将畜牧业发展起来，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当地村民世代从牧，他们熟知畜牧知识，也乐于参与畜牧相关产业项目，政府和企业辅助进行组织运作。第二，

挖掘当地特色手工艺,发展手工产业。第三,发展一些适合于本地人的旅游项目。旅游业一直是拉萨非常重要的产业,但是旅游业的人口流动性大,季节性强,因而“城市自身产业的培育和发展显得尤为必要和迫切。”^⑧及时转换思路,逐渐发展服务于本地游客的项目会使拉萨旅游业更具稳定性。

(三) 组织: 实现“双轨”运作模式

在我国,政府无疑是村庄治理中最重要的治理主体,“自上而下”的组织运作模式也是我国村庄管理的重要形式,但政府不是“万能药”,它有自己的具体职责。在拉萨,从村民的吃、穿、住到求学、工作、成家等一系列的人身重大事务无不存在着政府部门对其的帮扶与照料,拉萨各地政府着实是当地村民的“父母官”,一些村民就像被“溺爱”长大的孩子依附着政府。内生式发展模式在组织运作方面注重“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相结合的“双轨”运作模式,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工作。第一,简政放权,避免村干部包办等行为。相关部门要明确自己的职能位置,实地调研和倾听村民们的声音,真正做到“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双轨”管理模式。第二,发挥“乡贤”上传下达中介作用。“守土乡贤”^⑨可成为上传下达的中介,他们通常是在当地村民中有威望的人。第三,农村合作社和集体经济要以村民为主体。2017年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第三十一次会议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第三章明确规定:“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成员中,农民至少占成员总数的80%,”并且拥有“参加成员大会,享有表决权、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按照章程规定对本社实行民主管理”等五项权利。^⑩该法律条文的出台表明发挥农民在合作社中主体角色的重要性,其目的就是为了发挥农民的自主能动性。

注释:

①张环宇、黄超超、周永广:《内生式发展模式研究综述》,《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期,第62页。

② Nerfin, M. Another Development. Approaches and Strategies [M]. Uppsala: Dag Hammarskjöld Foundation, 1977.

③鹤见和子,川田侃:《内生式发展论》,东京:东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

④ [Kazuko Tsurumi, Tadashi Kawata. Endogenous Development Theory [M]. Tokyo: Tokyo University

Press, 1989.]

⑤ <https://www.xueshuchuangxin.com/theory/theoryDetail?guid=556&title=%E6%96%B0%E5%86%85%E7%94%9F%E5%8F%91%E5%B1%95%E7%90%86%E8%AE%BA>

⑥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乡土重建》,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

⑦西川润:《内生式发展的理论与政策》,《宁夏社会科学》,2004年第5期,第28页。

⑧杨小柳:《“三区三州”城镇化进程中的城市中心性——藏东昌都市的案例研究》,《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22年第2期,第49页。

⑨孙九霞、阿荣娜:《民族旅游场域中新乡贤的成长路径与社区角色研究》,《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20年第1期,第54页。

⑩《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 http://www.gov.cn/xinwen/2017-12/28/content_5251064.htm。

参考文献:

[1] Nerfin, M. Another Development. Approaches and Strategies [M]. Uppsala: Dag Hammarskjöld Foundation, 1977.

[2] 鹤见和子,川田侃.内生式发展论[M].东京:东京大学出版社,1989.

[3] 涂人猛.内源式乡村发展理论的渊源及发展[J].经济评论,1993,(4).

[4] 李淑华.人口控制与环境伦理[J].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2).

[5] 周大鸣,秦红.参与发展:当代人类学对“他者”的关怀[J].民族研究,2003,(5).

[6] 西川润,林燕平.内生式发展的理论与政策[J].宁夏社会科学,2004,(5).

[7] 胡霞.日本边远后进地区开发模式的反省和发展新方向[J].经济研究参考,2005,(27).

[8] 周大鸣,刘志扬,秦红.寻求内源发展——中国西部的民族与文化[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6.

作者简介:

田笑(1997.08-),女,贵州省铜仁市人,苗族,硕士研究生,从事“生态人类学”“民族地区社会发展”研究方向。